在2005年的新闻报道关于少林寺,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的武术,一个和尚解决了一个常见的误解:“许多人有一种误解,武术是战斗和杀戮,”和尚说,“这实际上是对提高你的智慧和聪明。”

的确，功夫的概念在西方很多人都是通过武打电影才知道的，比如《龙腾图》、《醉拳》，以及最近的《卧虎藏龙》。在电影界，像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这样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被视为“功夫大师”。

但正如少林和尚所指出的，功夫包含的远不止是打斗。事实上，任何实践和培养出来的能力都可以被准确地说成是功夫的体现。有舞蹈、绘画、烹饪、写作、表演、正确判断、与人打交道，甚至统治的功夫。在中国宋明时，“功夫”一词被新儒家、道家和佛教徒广泛地用于概括生活的艺术，他们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功夫的不同流派。

这种对功夫的广泛理解是我们开始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关键(虽然不是唯一的关键)，通过它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它与西方哲学传统的交汇和分离之处。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取向是关注如何生活，而不是发现关于现实的真相。

公元前4世纪，庄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他是梦见自己是蝴蝶的庄子呢，还是梦见自己是庄子的蝴蝶呢?-它比虚拟现实和《黑客帝国》早了几千年，既是对知识论的质疑，也是对功夫的启发。庄子并没有像笛卡儿的梦那样导致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是意识到他已经感知到了“事物的变化”，这表明一个人应该顺应这种变化，而不是徒劳地去寻找什么是真实的。

孔子“正名”的呼吁——一个人必须适当地使用词语——是保障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个功夫的方法比捕捉事物的本质,“名字,”或单词,占位符的预期持票人的名字应该如何表现和治疗。这就指向了奥斯汀所说的语言的“表演”功能的实现。同样，孟子和他后来的对手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其说是形而上学地断言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不如说是对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建议。虽然每个人对人性的主张彼此不相容，但它们在儒家传统中仍可作为另一种教化方式。

佛教的无我教义看起来当然是形而上的，但它的真正目的是将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根据佛教的说法，痛苦最终来自于对自我的依附。佛教的禅修是为了摆脱个人的依附而进行的功夫练习，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命题的真理而进行的智力探索。

用理查德·罗蒂的话说，把中国哲学的语言错当成“自然之镜”，就好像把菜单错当成了食物。功夫的精髓——各种各样的艺术，以及如何为人处世的指导——对于那些习惯了西方主流哲学的味道和质地的人来说，往往难以消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诚心诚意地去尝试，一个人仍然经常因为缺乏明确的关键术语定义和经典中文文本中缺乏线性论证而被拒之千里。然而，这并不是弱点，而是功夫取向的要求——就像学习游泳需要一个人专注于练习，而不是概念理解。只有超越对现实的概念描述，才能打开智慧之门，舞蹈和表演等艺术就是最好的例证。

哲学家的思想，即使是理论性的，也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作用。

这种对风格、微妙倾向和整体视角的敏感，需要一种类似于雅克•德里达所认为的克服西方语言中心主义问题所需要的洞察力。它甚至将认识论扩展到非概念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知识的可获得性依赖于认知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对每个人“公开可见”的任何东西。它还表明，对人的培养并不局限于“知道怎么做”。“一个模范的人可能很有感召力，但不一定知道如何感化他人。在功夫艺术中，有一种被赫伯特·芬格莱特称为“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独特的人性”的实用维度，这种维度“总是包含着不费力气、令人惊叹地产生的巨大效果，以及一种本身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不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皮埃尔和玛莎努斯鲍姆,部分由于哲学的历史性对话在我们这个时代,都试图纠正这个名字的“哲学”等表明,古代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主要关心的美德,与灵性练习和实践为了一个好的生活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努力。在这方面，西方哲学的起源与中国古典哲学相似。这一点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历史事实。它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已经被对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及其实践方式(即通过理性论证)的痴迷所掩盖。即使哲学家们把他们的思想当作纯粹的理论论述，目的是寻找真理，他们的思想也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作用。现代启蒙思想的力量已充分表现在我们自近代以来所目睹的巨大成就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深刻问题两方面。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学思想形成的，这些思想看起来很天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罗蒂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全面批判的时候，他想当然地认为哲学只能以寻求客观真理的形式存在，这既是讽刺又是警示。他对哲学的拒绝也落入了他告诫人们要小心的陷阱——仅仅把哲学思想当作“镜子”而不是“杠杆”。

人们很可能认为中国功夫的观点是一种实用主义。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上世纪初杜威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时，后者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原因。然而，功夫视角为实用主义方法增加的是它对人的培养和改造的明确强调，这一维度在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但常常被忽视。一个功夫大师不仅仅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使用有效的工具来满足一个人的偏好。事实上，这门学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被接受的。而有效的行动可能听起来合理的决定的结果,一个良好的行动展示功夫必须植根于整个人,包括一个人的身体的性格和情绪,和它的好处不仅体现在其后果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它还提出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背景”——如传统和社区等因素——在我们理解一个人的信仰和态度的形成过程中。通过功夫的方法，中国古典哲学表现出一种整体的视野，将这些边缘维度聚集在一起，从而迫使人们密切关注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

这种功夫方法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有很多相同的见解，后者关注的是主体的培养，而不是行为规则的制定。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同的是，功夫伦理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形而上学来证明。一个人不必为了欣赏功夫所带来的卓越而相信预先设定的终极目标。这种方法确实导致了对形而上学观点的重要指导作用的认识。例如，一个遵循亚里士多德式形而上学的人显然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自己的智力上，而一个遵循儒家式关系形而上学的人则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协调人际关系的礼仪上。这种方法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允许多种相互竞争的卓越观，包括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通过它们来理解和指导，然后将这些信仰的正当化留给具体的人类经验。

功夫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强权即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将功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更为恰当的原因之一。艺术最终不是由它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来衡量的。此外，艺术的功能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反映;它的表达不拘泥于普遍原理和逻辑推理的形式，它需要艺术家的修养、美德的体现、想象力和创造力。正如皮埃尔·哈多所说，如果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功夫的方法表明，我们把哲学看作是对美好生活的艺术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理性的生活方式。